

文化翻译理论下的《浮生六记》林语堂译本翻译研究

——以第二章为例

王晨朝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石家庄 050061

摘要: 文学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促进文化传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林语堂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曾获诺贝尔奖提名,他所译的《浮生六记》对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无数翻译理论中,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提出的文化翻译理论对翻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指导了无数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本文将从文化翻译理论角度入手,研究《浮生六记》林语堂译本第二章“闲情记趣”的翻译策略,以期为今后的翻译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文化翻译;《浮生六记》;林语堂;苏珊·巴斯奈特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of Six Records of Floating Life under the theor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 Take chapter 2 as an example

Chenchao Wang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Abstract: Literary translation, as a unique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fostering encounters and fus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Lin Yutang, a highly accomplished literary figure who was once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rize, had a profound impact with his transl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Among numerous translation theories, Susan Bassnett's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has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ion field and has guided the translation of countless literary works. This paper will approach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hapter Two, “Leisure in Life,” from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future translation research.

Key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Lin Yutang; Susan·Basnet

引言:

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思想转变,人们进一步了解其它国家的文化,同时也不断传播自己国家的文化。翻译活动在这种文化传播过程中十分重要,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可以传播自己国家的文化,彰显文化软实力。文学翻译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张林娜,2020:87-89)。《浮生六记》是严复所著的一本自传,由林语堂译成英语,传播海外。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扎根于文化之中,重视文化交流,力求实现文化功能对等,它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观

念,将文化翻译研究带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浮生六记》这类的中国古代文学典籍蕴含着不少中国的优秀思想和文化,这些思想和文化需要得以保存和传播,也需要被更多国外人士了解,因此就需要考虑文化上的功能对等。鉴于此,笔者将根据文化翻译理论来分析这类文学作品的翻译,以期为日后的翻译提供指导。

一、文化翻译理论对于文学翻译的适用性

语言学家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要想解决翻译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就要确定好语言之间的基本单位的等值,于是语言学家们试图找到语言单位,从最初的音素、词

素到句子、篇章，人们的研究不断深入，认识不断加深。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翻译研究》（1980）中提出了文化翻译理论，强调翻译应该以文化为视角。九十年代，她与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合编《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在该书中提出了“文化转向”，系统阐释了文化翻译理论：首先，翻译应该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而不是停留在以往的语篇之上；其次，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解码—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再次，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上的等值；最后，不同时期翻译的原则和规范不同，翻译应该满足文化和群体的需要。她认为翻译不是一种纯语言行为，而是文化之间的交流行为，深深扎根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目的是实现文化转换（Bassnett & Lefevere, 1990）。

简言之，文化翻译理论重视文化交流，提倡文化第一，信息次之。该理论的核心是实现文化功能对等，要实现文化功能对等，就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当两种文化差异较大时，译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

二、文化翻译理论下的林译本《浮生六记》案例分析

《浮生六记》是由清代文学家沈复（1763—1825）创作的自传体作品，素有“小《红楼梦》”之称，被翻译成多门外语，自首次刊行以来就广受欢迎。古典文学研究家陈毓罍称其继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之后，开创了家庭文学小品之光辉范例（1996：3）。该书共“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六章，以沈复夫妇的日常生活为主线，叙述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他们一起赋诗论文，邀游山水，二人情投意合，却因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理想破灭。该书以浓墨重彩描写沈复夫妇在简朴的生活中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谱写了一曲爱情的颂歌，其对于爱情的描写，足可列于中国文学之上乘。

译者林语堂同样颇受推崇。其一，他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成绩斐然；其二，他拥有高超的艺术造诣和非凡的文化修养；最后，他的英语精纯娴熟，足以使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敬佩又深感惭愧（梁林歆，许明武，2017：53-59）。林语堂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强调积极传播中国文化，让西方人重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让中国在西方重新获得话语权。他的翻译并没有拘

泥于形式和内容，而是根据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翻译，同文化翻译理论一样，他所注重的是文化内涵。

鉴于此，通过分析第二章“闲情记趣”，笔者发现林译本很好地实现了文化功能对等。关于林译本中的翻译策略，主要从增译减译、调整语序和一词多译三方面进行分析。

1. 增译减译

例1：贪此生涯，卵为蚯蚓所哈（吴俗呼阳曰卵），肿不能便。捉鸭开口哈之，婢姬偶释手，鸭颠其颈作吞噬状...

I was a naughty boy, and once my ball (for we call the genital organ a “ball” in Soochow) was bitten by an earthworm and became swollen. [believing that the duck’s slava would act as an antidote for insect bites,] they held a duck over it, but the maid servant, who was holding the duck, accidentally let her hand go, and the duck was going to swallow it...

这句话描写的是作者小时候贪玩被蚯蚓咬伤，婢姬捉鸭子疗伤的情景。译者在翻译时进行了增译和减译，“肿不能便”译成了“became swollen”，省去了“颠其颈”，并解释了“捉鸭开口哈之”是因为“the duck’s slava would act as an antidote for insect bites”。“便”在这里是“小便，方便”的意思，同“鸭颠其颈”一样，都是不太重要的信息，故译者对“肿不能便”和“鸭颠其颈”都做了省略，省略后的句子对译文读者理解原文没有什么影响。反之，译者做的这部分补充是很重要的，因为英语读者不知道鸭子的口水可以治疗昆虫咬过的地方，如果不做解释直接翻译，英语读者就会不知所云，自然也就理解不了这段话所表达的含义。在这句话中，译者考虑到了文化因素，将“鸭子的口水能治昆虫叮咬”这一有趣的背景信息补充出来，使译入语读者在读书的过程中也能了解这些传统的中国文化，满足了文化传播的需要，因而使原语读者和译入语读者达到了相同的阅读体验，促进了文化交流。

例2：背作横方纹，如云林石法；巉岩凹凸，若临江石砢状。

On its back, we made rugged square lines in the style of rock paintings of Ni Yunlin, so that the whole looked like a rocky precipice overhanging a river.

这句话的意思为，“在它的背面，我们参照倪云林画石头的风格画了一些弯曲的方形花纹，以至于画上的崎岖岩石，凹凸不平，就好像江边的大石头一样”。林译本对后半句做了意思上的省略处理，将“巉岩凹凸”与

“石矶”合并，翻译为“rocky precipice”，意为“岩石遍布的悬崖”。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差异，英语好用长句，注重句子结构，通过使用连词、从句、修饰词、标点符号等延长句子，而汉语好用短句，是一种“竹节式语言”，看似无逻辑关系衔接，实际上逻辑关系都隐藏在句子意思中。同时，汉语倾向于将景色描写得生动形象，使人读起来也能身临其境，而英文一向简洁，只是将意思表达出来，以便达到交流的目的。在该例子中，原文用了四个小短句，简洁生动，具体形象，读起来朗朗上口，而译文只用了一句话进行表达，并加以介词短语，连接词等进行修饰，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译者没有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句句对应，而是考虑到了英语读者的表达习惯，将一些相关元素合并，进行减译，使译文行文更流畅逻辑更通顺，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实现了文化上的功能对等，做到了减译不减意。

2. 调整语序

例3：街头有鲍姓者，卖馄饨为业，以百钱雇其担，约以明日午后。

There was a wonton seller by the name of Pao, whom we asked to go along with us the following afternoon, offering to pay him a hundred cash...

在这句话中，译者将“以百钱雇其担”处理成了现在分词引导的从句，并将它移到了“约以明日午后”的后边，同时译者按照英语的表达习惯，将“卖馄饨为业”处理成了“卖馄饨的人”，即“a wonton seller”，并将“有鲍姓者”处理成介词短语“by the name of Pao”对其进行修饰。此外，译者补充了一些主语和逻辑词，将原文中隐形的成分都补充出来，使得句子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因此英语往往按照固定的形式来组织句子，汉语则通过字词的意思，表达方式灵活多变。在译文中，译者以“街头有鲍姓者，卖馄饨为业”为主句，并以“whom”和“offering”为修饰成分，译成从句。这样的处理，使句子结构紧凑，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作者没有拘泥于表面的形式，而是通过句子内部的逻辑和文化关系进行句子重组，因此很好地表达了句子的意思，符合文化翻译理论。

例4：携盒而往，对花冷饮，殊无意味。

If we brought eatables along in a basket, there was little fun drinking cold wine in the company of the flowers.

此句做了语序上的调整，将“殊无意味”移到了“对花冷饮”的前面，译成了英语中“there be”引导的

句型，并且把“对花”译成了介词短语放到了“冷饮”后面加以修饰。英语是形合的静态语言，重心在前，且重前饰，因此将表示评论的成分“there was little fun...”放到句首，然后再添加相关成分，然后把中文中的动词“对”转换为介词短语“in the company of”做修饰成分，因此句子逻辑感强。而汉语是意合的动态语言，成“竹节状”结构，通常把评论性的句子放到最后，擅用动词，句子结构比较松散，但是能体会出深层次的逻辑关系。译者并没有按照原来的句式结构顺译，而是根据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语序上的调整，按照意思进行翻译，侧面说明译者考虑到了英汉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根据目的语读者的反应做此改变，从而达到了文化功能上的等值。

3. 一词多译

由于古代汉语经常存在一词多义的现象，翻译时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辨别，进行一词多译。汉语的使用和表达都相对灵活，翻译时常常需要根据语境来做出决定。通过阅读分析，笔者发现“我”、“曰”和“端”这三个词存在一词多译现象。

在第二章“闲情记趣”中多次出现人称代词，包括“余忆童稚时”、“私拟作群鹤舞空”、“我自担炉火来”、“妾见市中卖馄饨者”等等。这里面的“余”、“私”、“我”和“妾”在译文中都翻译成了“I”。古代汉语中存在大量一词多义的现象，“我”在古代汉语中，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些意思外，还有“于”、“孤”、“予”、“吾”等等。但是英语中表示“我”的只有“I”，所以文中用“I”表示各种各样的“我”，也从侧面表现出汉语的多样性以及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

此外，译文中芸与沈复对话时所用的“妾”也被翻译成了“I”。“妾”这个字体现了中国古代封建文化对女子的思想束缚。林语堂在翻译时考虑到了不同时期的翻译所具有的不同原则和规范，古代的一些文化糟粕在翻译时应该弱化或舍弃，它们无法代表我们现在的文化。为了满足文化和国外读者的需要，译者作了回避处理，除去了中国封建思想的束缚，使男女地位更加平等，也从侧面表现出沈复夫妇之间的甜蜜恩爱，同时还能给外国读者展示更加正面的中国形象，传播更加正面的中国文化。

文中也多次出现“曰”，译者同样将其处理成了不同的意思。在第二卷中，译者根据语境将“曰”分别处理成了“said”、“replied”、“asked”、“called”、“exclaimed”和“suggested”，有的地方甚至做了省略。同理，沈复在

讲述自己的省俭生活时，介绍了两种芸所用的省俭方法：用精致的梅花盘子装菜小酌和缝补衣服用颜色相近的面料，因此衣服整洁，“可出客，又可家常”。“即食物省俭之一端也”翻译成了“This is an example of economy in the matter of food”，“此又服饰省俭之一端也”翻译成了“This is an instance of economy in the matter of dress”，这两句中的“端”分别译成了“example”和“instance”。译者也是根据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进行翻译的，英语喜欢替换，习惯用各种不同的词语来表现内容，具有多样性，而汉语喜欢重复，往往会重复之前的内容。这样的翻译，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使得译文读者可以更快地接受译文所表达的信息，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因而达到文化交流地目的。

三、总结

在当代大背景下，文学作品的翻译十分重要，有助于实现文化间的交流，促进文化传播。在文学翻译领域，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指导了无数文学作品的翻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浮生六记》很早之前被林语堂翻译成英文，远销海外，收到了不少海外人士的大力欢迎，其描写的沈复夫妇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简朴生活

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基于文化翻译理论角度，从增译减译、调整语序和一词多译三个方面来对《浮生六记》林语堂译本的第二章进行对比分析，笔者发现林语堂很好地运用了文化翻译理论，为国外读者带来了高质量的英文译本，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传播本国的优秀文化、思想是我们的责任，通过不断努力和探索，定会找出更加合适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M].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 4, 8.
- [2] 陈毓罍. (1996). 沈白石和他的浮生六记[M]. 台湾: 台湾大安出版社, 1, 3.
- [3] 沈复著. (1999). 浮生六记[M]. 林语堂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4] 梁林歆, 许明武. (2017). 国内外《浮生六记》英译研究: 回顾与展望[J]. 外语教育研究, 4, 53-59.
- [5] 张林娜. (2020) 文化翻译观下的汉译英[J]. 现代交际, 23, 87-89.